

综合选集卷

唐宋八大家文选

(上)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综合选集卷

唐宋八大家文选(上)

陈霞村 阎凤梧一注析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宇工作室



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大致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说唱五大类别，其中散文的历史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应用性也最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可以不使用诗歌、小说、戏剧和说唱，却不能不使用散文。散文是形成文字的口语，一旦没有散文，人际交流就很难进行，社会生活就会停滞不前，可见散文对我们是多么重要。

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这些散文现在读起来，还是那样质朴自然，真切生动，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某些篇章。魏晋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虽然对提高散文的修辞和文采有一定作用，但总体上说，它是对先秦两汉散文的破坏与反动。这种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的文体，仅在上层社会流行，与普通人全不相干，从而严重阻碍了政令的通行和人际的交流。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不断对骈文发起抨击，要求改革文体的呼声不绝于耳。

唐代中期，为了复兴儒家学说的政治和文化需要，韩愈、柳宗元不惧嘲讽排挤，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

上,他们提出了明道的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旗帜鲜明,论辩有力。在创作上,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体裁众多、风格多样的古文范本,业绩雄厚,令人信服。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要求继承与发扬先秦两汉作家用当时口语作文的精神,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体。韩愈、柳宗元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向占据统治地位的骈文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培养并影响了当代和后代的一批散文家,把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晚唐至北宋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和统治阶层的审美偏好,骈文依旧流行,散文与骈文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的出现,才对持续了百余年之久的文体斗争作了最后的总结。欧阳修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要求关心人间“百事”,从“百事”中去体会道,而不是抽象的儒家教条。这种主张有利于推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的“庆历新政”,因而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欧阳修宽厚仁爱的道德品质,平易畅达的文章风格,又受到广大文人的推崇与拥戴,成为天下公认的一代文宗。尤其是他利用主持科举的权力,斥退了一批迷恋骈文的士人,提拔了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创作出十分丰富的典范作品,最后完成了韩愈、柳宗元首倡的古文运动,其巨大影响直至明清而不衰。经过历史的长期淘洗,人们普遍认为在众多古代散文家中以“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最为突出,于是有了明代朱右的《八先生文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选本流行于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阅读古文的需求,我们编选了本书。选篇标准以现实性、应用性和艺术性统筹兼顾为原则,既有传统的典范作品,又有切近现实的议论文章,希望对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事业有所启迪。例如柳宗元的《晋问》,就是在胡耀邦同志来山西视察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阅读该文,由编者翻译发表的。本书于1986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平装本,后又以精装本多次重印。1994年,由台湾建宏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发行。这次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纳入《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综合选集卷》加以出版,对部分文字作了一些修订。依照注译本书的分工,韩愈、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由陈霞村执笔;柳宗元、苏轼、苏辙、曾巩由阎凤梧执笔。

疏误之处,敬请指教,不胜感荷!

陈霞村 阎凤梧

2008年6月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代序)

姚奠中

在中国汉语文学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古文运动”。一次在中唐,以韩愈、柳宗元为首领;一次在北宋,以欧阳修为主盟。韩、柳之后,李翱、皇甫湜等人的写作成绩,不能和韩、柳相颉颃;欧阳修之后,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写作成绩虽亦有广狭高下之分,然尚足为欧阳修之羽翼。到了明代,便以八人并称,号为“唐宋八大家”。最早把他们的文章合为一集的为朱右,但那个本子早已佚失;其后便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至今流传不绝。关于八家的次序,朱氏的排列是:韩、柳、欧阳、曾、王、三苏;茅氏则变为:韩、柳、欧、三苏、曾、王。以后便成了习惯的提法。经过清代“桐城派”的传扬,八家的影响,便从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壤,成为一切开笔作文者的典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其光环才逐渐淡去。

所谓“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散文为什么要改革呢?原因是散文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语言不断变化,相应的散文也不得不进行变革。比如商周时代的《尚书》,其中不少文章像“周诰”“殷盘”等,后人很难读懂,韩愈称之为“诘屈聱牙”,因为它记录语言时,虚字即语气词很少,当时人能懂,后来的人就懂不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

动乱、大变革的急迫需要下，便创造了有大量之、乎、者、也、已、焉、哉等一系列语气词的散文，在记录语言上做到了“无不达己意，无不喻己情”的地步，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是代表。这是散文的一次大跃进、大变革。

但这时又出现了“雅言”和“俗语”、“方言”的矛盾。以《论语》为首的诸子，基本上属于“雅言”系统，而“雅言”的性质相当于今天所谓“普通话”。这是吸收各地“方言”中最共通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文体，既适用于一个地区，也适用于九州各国。这就叫作“文言”，不合这个标准的，就会因“言之不文”而“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但它和口头的“方言”、“俗语”却有了一定距离。口头语言变化很快，这种矛盾，也越来越大。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文字——“书同文”。于是，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义、一义多字的现象，成了汉语的特色，也为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词汇。这就是文言散文的传统。这一传统持续了两千多年，为华夏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散文终究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而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要求，不断变化着，要充分用文字表现出来，就需不断地吸收口语中生动活泼的成分，来提高它的表现力。历史上的散文家，在这方面做得越好，他的成就就越大；而司马迁正是做得最好的典范之一。从班固起，开始有远离口语的倾向，经魏晋到六朝，就出现了畸形的形式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所谓“骈文”。在当时的士族门阀统治下，文化只掌握在少数上层分子手里，于是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内容空虚，而只追求字句对偶的美、辞藻华丽的美、用典巧妙的美、音调谐和的美，使文章成为统治阶级的装饰品、玩赏品，全不切实用。尽管其间个别作者，像鲍照、庾信等人也写有题材严肃、感情真挚的作品，但因文体的限制终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六朝骈文，代表着散文发展史上极端衰敝的文风。

到了唐代，时代变了，而骈俪之风却仍长期占着统治地位。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武，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文学，却只拿来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自己也附庸风雅，追步齐梁。故齐梁馀风，风靡一时，而且延续达百年之久。但由于这种文体难以为现实服务，所以早在六朝骈俪盛行的同时，要求改革的呼声，已不断出现。北周苏绰，曾作《大诰》以立散文的标准；隋文帝杨坚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臣李谔也上书请革文弊。初唐“四杰”，为骈文高手，却也有改革要求，至陈子昂遂高举反齐梁的旗帜。盛唐以来，萧颖士、李华，在创作实践上都能突破六朝藩篱，各自成为名家；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为“古文运动”奠定了丰厚的基础，韩、柳继起，遂使这一次散文改革运动达到高潮。

唐代以“古文”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是散文发展史上对骈俪歧途



的拨乱反正。而这个拨乱反正,又和当时的儒学复古潮流紧密联系着,也和时代的需求分不开。盛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关键时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从这次大乱后,适于粉饰太平的骈体文,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了,需要的是能为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切于实用的文体。

在韩、柳的当时,古文虽在文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也出现了除韩门李翱、皇甫湜等人以外,白居易、元稹、吕温、刘禹锡等大批作者。但随着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濒临崩溃的形势,坚持古文以批判现实的作家像皮日休、陆龟蒙一类人越来越少。而由宦海浮沉转为醉生梦死、荒淫堕落文人则日见其多。于是适于自欺欺人、以浮华掩真实的骈文,又一度盛行起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就代表着这一转变。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变乱,直到北宋,文章的工巧靡丽超过了六朝,而以李商隐为不祧之祖。赵氏王朝,建立了空前的君主专政,而官僚们更可以在高度的物质享受下,优游俯仰其间。杨亿、刘筠为首的达官集团,在诗歌方面有《西昆酬唱集》为靡丽诗风的代表,而其文也与之相辅,被称为“西昆体”。他们“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这种文章的特点,形式上比六朝更整齐,所谓“骈四俪六”,基本上全是四、六句,内容上不只是空,而且是伪。文章至此,完全走上死路。而政治局势内忧外患,促使朝野人士,产生了维护政权和进行改革的迫切愿望。以此为契机便出现了第二次“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柳开、穆修、石介为前驱,从理论上给予时文以沉重打击,为古文开拓道路,而王禹偁则在写作实践上作出了成绩。韩愈当年在尊儒反佛写古文的过程中,曾提出所谓“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道”的“道统”理论,而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则既强调“道统”又强调“文统”,两“统”都以韩愈为崇拜偶像。到了欧阳修借两次“知贡举”的机会,用政治力量,严禁考生写作骈文而大力提倡古文。三苏、曾、王都是在他提拔影响下成为一代作家的。欧阳修便是当时公认的韩愈“道统”“文统”的继承者。加上他的政治地位(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即副统帅、副首相),影响也特别大。苏轼曾说:“愈(韩愈)后三百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居士集序》)而《神宗旧史·本传》中说:“至修文一出,天下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欧阳文忠公集·附录》)所以宋代的“古文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者,而且较之唐代更容易地取得了成功。

这两次“古文”即散文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贡献,主要在新散文的创作上,但所标榜的却都是“文以明道”。“道”是第一位,而“文”是第二位的。他们都尊儒,而宋人提得更响亮;他们都提到“道统”,而宋人提得更普遍更明确,而且加上了“文统”。他们具体主张当然也有差别。比如同一“道”,韩愈、欧阳修等所指都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柳宗元、三苏,

则强调的是“理道”(治世之道)和“有补于国”的道;同一尊儒,韩愈、石介等力排佛老,而柳宗元、苏轼等,却不排佛老。但总的看来,他们多半并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而是散文家,是在整个散文发展史上,起着革新和创造作用的,他们的文集,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

韩愈、柳宗元不仅时代上居“八家”之首,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散文创作,足以领袖群伦。前人对韩愈的文章,很重视他的理论文。其实韩的理论文,不在于说理说得怎么高明,而在于他具有一种蓬勃的气势。这种蓬勃的气势,源于炽热的感情,炽热的感情,源于现实的激发和典籍的陶冶。他的《原道》、《原性》、《原毁》、《论佛骨表》,固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者分明的爱憎,但与其说是说理精深,倒不如说是“攻势凌厉”。他的抒情性论文,像《伯夷颂》、《获麟解》、《杂说》一、四之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论点,都不能不受它的感染而为其所激动。弱于理、强于气,很有点近于《孟子》。只有《师说》、《争臣论》等篇,词明理举,堪称论文的佳作。

韩愈散文中成绩最大的,应该是他的传记文,包括大量的墓志在内。这里除过违心的谀墓之词外,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多彩的。韩愈的赠序,是一个创造。他的大量的赠序文,都是抒情文的上品。长篇像《送李愿归盘谷序》,短篇像《送董邵南序》,或故作旷远,或强作劝勉,而郁勃之气,溢于言表。

柳宗元的文章,最大的特色不是感情而是理智。他青少年时期就博极群书,而且善于把书本和现实相印记。他曾说:“信书成自误,经事始知非。”(《三赠刘员外》)因之他的全部作品处处闪耀着理智的光芒。他的理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是周秦以来历史的总结。条分缕析,反复论证,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桐叶封弟辩》、《断刑论》以及《非国语》之属,莫不如此。单就文学方面来看,他的最大创造,是寓言和辞赋。辞赋中除直接抒情以外,也多以寓言行之。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文,是柳宗元的另一创造。这些游记,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然风光观察体味的深刻细致,而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世情感溶化于自然景物之中,使山水也具有了他的思想性格。

北宋古文家,并尊韩、柳而侧重于韩。欧阳修又强调“韩李”(李翱),说明他们不仅反对了骈俪,也反对了由韩的“怪奇”而导致的险怪一路,而只走李翱所承继的韩的“文从字顺”。欧阳修致力最大的是传记文,他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主编和编著者列身于史学家之林,而作为文坛领袖,自然也以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他写传记文的标准是:“事信,言文。”(《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要“事信”,就要调查考证;要“言文”,就要斟酌于详略、剪裁。这在他的《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说得最清楚。



事信”需要客观,而“言文”又不能不带主观色彩。他的史传和史论,大都具备这两个特点。理论文他虽不见长,但《朋党论》、《纵囚论》等,却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文章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味,而只是反复论证,抑扬顿挫,从容不迫,以理服人。他的“序”(书序、赠序)、“记”(记亭、园、台、堂)多有名篇,在写作上则夹叙夹议,间以描写,往往有“一唱三叹”之妙。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齐名,而各有不同风貌。苏洵长于政论,高者可以与《战国策》中的名篇比美。《辨奸论》勇于干预现实,支持改革派,很有斗争精神;《六国论》借战国史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反对宋王朝的对外屈辱政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苏轼博学、多才、有识,结合着他一生所走的不平坦的道路,接触社会面相当宽阔,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他尊儒而喜释道,对事、对人、对物,他常有独到的深刻见解。他不固执,也不圆滑,随遇而安,无所不适。表现在文章中,是十分丰富、复杂而又汪洋恣肆的。他有一部分理论文,好矜奇立异,抓一个特点作为一篇的中心,反复论证,以达到预期的结论,《留侯论》可作代表。他把张良一生功业成就的关键,说成是在于“能忍”,在于“忍小忿而就大谋”,道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却不能不佩服他文章所具有的魅力。他的杂文、杂记,往往对事理观察入微,富于哲学气味,而又妙趣横生。像《日喻》,用瞎子不能靠别人的指点认识太阳,来说明“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道理,因为一切事物的规律,主要从不断地实践体验中得来,其精微之处,的确是不可言传的。这种道理《庄子》说得最透,而苏轼文中也写有不少这方面的体会。苏轼的前后两篇《赤壁赋》,是他的另一方面的名作。他用平易精炼的语言,写流连于江山风月之间的人物,怀古伤今,抒发对人生的感慨。终于把沉郁苦闷的心情,溶化于物我两忘的境界,达观而非消沉。写景抒情,各极其妙,是散文赋的杰作,是有辞赋以来所未有的。苏辙与乃兄相形之下,当然要减色得多,但他的佳作,亦复能独自树立。他长于叙记文。《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可为代表。《快哉亭记》极写山川形胜,联系对古人古事的怀念,从而抒发其政治失意而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心情。文章雄放而有风致。他的其他作品,大都委曲明畅,时有秀气。

曾巩的散文,《宋史》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骤,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为文者,鲜能过也。”(《本传》)实际上他和欧阳修最为接近,也最为欧阳修所赏识。他的《墨池记》说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好,在于“精力自致”,而不是“天成”,强调了“学”的作用。他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是一篇很好的“荒政”总结。写得委曲周至,事理明析。由于他以儒家正统自居,故文章也以“古雅”、“平正”为特点。他的有名的《战国策目录序》,把策士们的言论作为“邪说”,而鼓吹“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体现了强烈的儒家卫道士的观

点,这是他所以不能有更大成就的原因。

王安石在历史上以变法著名,但在学术上却是儒法并用而以儒为主,只是在写作上吸收了法家精神而已。他特别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他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这和柳宗元的主张一致。一般说他的文章,精悍严密,逻辑性强,全没有淫词滥语,而说理明透。长篇论文如此,短篇也不乏脍炙人口的名作,像《答司马谏议书》,就司马光的来书,一一辩驳,针锋相对,点滴不漏,使对方难于反对;而《读孟尝君传》更一扫千馀年来人们对孟尝君“得士”的评介,提出相反的结论。不到一百字的短篇,却写得层次分明,转折有力,真是得未曾有。尽管这两篇文章的论点不无欠缺之处,但作者驱遣文字功夫,却是很少见的。

由于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由于“八大家”的写作实践,使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由宋、金、元到明,一直统治着文坛。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矛头指的是“时文”即“八股文”,有一定意义,但他们标举秦汉,排斥唐宋,没有创造出新文体;而唐顺己、归有光等人,重整旗鼓,直承“八家”,“八家”之称,也从此确定下来,但承袭多,发展少。宗唐宋与宗秦汉,乃“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其作用不能和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相比。到了清代,与“时文”对立,在各体骈、散文都在复兴的情势下,桐城派又一次掀起了一个古文高潮。他们总结了“八家”的写作特点,提出了所谓“古文义法”,传授不绝。尽管他们讲的“义”、“法”,又造成了新的框框,成了散文写作的新桎梏,以至“五四”时代,被称为“桐城妖孽”,但“唐宋八家”的创作经验,却仍然值得我们重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它虽是脱离口语的文言,但不断以词汇的更新维持其与口语的联系,表现力较强。

其二,字句、篇章,没有死硬的格式,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自由抒写,桎梏较少。

其三,虽形式自由,但仍有章法、篇法以至句法、字法可循,有腔有调,有节奏感,富于感染力。

当然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深厚充实的内容,就仍会成为可憎的滥调!作为优秀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批判地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借鉴其形式,是有益的、必要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责任。

姚萸中,1913年生,山西稷山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书法家、诗人。于1935年考取章太炎先生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先后在安徽、贵州、云南等地从教。1950年回到山西,任山西大学教授至今。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章太炎学术年谱》、《姚萸中诗文辑存》、《姚萸中讲习文集》等。以上“代序”选自《姚萸中讲习文集》。



目录

前言 /001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代序）
（姚奠中）/001

◎韩 愈

原毁 /002

杂说一（龙说）/005

杂说四（马说）/006

师说 /007

讳辩 /010

进学解 /013

争臣论 /018

送孟东野序 /024

送李愿归盘谷序 /029

送董邵南序 /032

送石处士序 /034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037

赠崔复州序 /039

送杨少尹序 /041

赠张童子序 /044

送高闲上人序 /047

《荆潭唱和诗》序 /050

张中丞传后叙 /052

答尉迟生书 /058

与孟东野书 /059
应科目时与人书 /062
答李翊书 /063
圯者王承福传 /067
毛颖传 /071
燕喜亭记 /075
蓝田县丞厅壁记 /078
祭十二郎文 /081
祭鳄鱼文 /086
送穷文 /089
柳子厚墓志铭 /093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099
子产不毁乡校颂 /103
五箴 /104

◎柳宗元

桐叶封弟辩 /111
捕蛇者说 /113
观八骏图说 /116
黑说 /118
序棋 /119
骂尸虫文并序 /121
三戒并序 /125
螾蜃传 /129
鞭贾 /130
起废答 /132
六逆论 /137
封建论 /141
晋问 /150
送薛存义序 /169
愚溪诗序 /171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74
与韩愈论史官书 /180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84
种树郭橐驼传 /188
梓人传 /190
童区寄传 /195
宋清传 /198
李赤传 /201
段太尉逸事状 /204
永州铁炉步志 /209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211
始得西山宴游记 /213
钴姆潭西小丘记 /215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217
小石城山记 /219

◎欧阳修

朋党论 /222
纵囚论 /225
五代史伶官传序 /227
五代史宦者传论 /230
集古录目序 /232
梅圣俞诗集序 /235
苏子美文集序 /238
江邻几文集序 /242
送徐无党南归序 /244
送杨真序 /247
与尹师鲁书 /249
上范司谏书 /253
与高司谏书 /257
答吴充秀才书 /262
樊侯庙灾记 /265
相州昼锦堂记 /267
丰乐亭记 /270
醉翁亭记 /273



真州东园记 /275
偃虹堤记 /278
菱溪石记 /281
丛翠亭记 /283
游儵亭记 /285
秋声赋 /288
祭石曼卿文 /290
祭尹师鲁文 /293
泂冈阡表 /295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300

◎苏 洵

管仲论 /306
谏论(上) /310
谏论(下) /315
六国论 /319
心术 /322
广士 /325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330
上余青州书 /335
仲兄字文甫说 /339
名二子说 /342
张益州画像记 /343
木假山记 /348
老翁井铭 /350
送石昌言使北引 /352

◎苏 轼

刑赏忠厚之至论 /356
留侯论 /359
贾谊论 /363
晁错论 /367
决壅蔽 /371

教战守 /376
稼说 /381
日喻 /383
答毛滂书 /386
答谢民师书 /388
方山子传 /391
喜雨亭记 /394
凌虚台记 /397
超然台记 /399
放鹤亭记 /403
记游松风亭 /406
李君山房记 /407
石钟山记 /411
筼筻谷偃竹记 /414
记承天寺夜游 /418
游白水书付过 /419
韩幹画马赞 /421
书蒲永升画后 /422
黠鼠赋 /425
前赤壁赋 /427
后赤壁赋 /431
潮州韩文公庙碑 /434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442
为兄轼下狱上书 /445
武昌九曲亭记 /447
黄州快哉亭记 /450
南康直节堂记 /452
东轩记 /455
齐州冻源石桥记 /458
孟德传 /460
御风辞 /463

◎曾 巩

唐论 /468
救灾议 /472
书魏郑公传后 /479
战国策目录序 /482
寄欧阳舍人书 /486
谢杜相公书 /490
送江任序 /492
送周屯田序 /495
赠黎安二生序 /498
送蔡元振序 /500
宜黄县县学记 /502
拟岘台记 /507
鹅湖院佛殿记 /510
墨池记 /511
越州赵公救灾记 /513
学舍记 /517

◎王安石

兴贤 /523

目

录

原过 /525
复仇解 /527
读孟尝君传 /530
同学一首别子固 /531
送孙正之序 /533
伤仲永 /535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537
进戒疏 /567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570
上人书 /576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579
上运使孙司谏书 /581
答司马谏议书 /586
游褒禅山记 /588
芝阁记 /591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594
祭欧阳文忠公文 /596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599

◎ 韩 愈

韩愈(768—825),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氏郡望为昌黎(今河北昌黎县),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中进士。贞元十八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不顾世俗讥笑,抗颜而为人师,广收门徒,组织文学改革的生力军,被诬为狂人。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关中天旱人饥,他上书请求减免徭役赋税,触怒权贵,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任太子右庶子时,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因功升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书反对迎拜佛骨,慷慨陈词,触犯宪宗尊严,几乎被杀,幸得裴度、崔群等人援救,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由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奉召回京,任国子祭酒,又转为兵部侍郎。其间韩愈曾出使镇州(今河北正定县),制止了王廷凑的叛乱,因功升为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唐敬宗宝历元年死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在政治上,他一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思想上,他大力提倡儒家道统,以儒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自居,力图以孔孟所宣扬的封建等级制度、伦理制度和道德、文化传统,挽救中唐政治危机。韩愈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反对佛教和道教的社会虚无思想,对因果报应、长生不老等宗教迷信思想,深恶痛绝,严加驳斥,认为它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欺骗伎俩,指出佛老之徒是一群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减轻人民负担,具有进步意义。在文学上,他全力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以利于传播儒道,排斥佛老。他的文学理论首先强调文与道的统一,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同时承认形式对内容的重要作用,“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其次,他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的著名论点,要求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有所革新和创造,反对模仿抄袭,主张熔铸新词。文章语言要“与事相侔”,“因事陈词”,达到“文从字顺各识职”,合乎当时的语法规律。第三,韩愈很重视“文气”问题:“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认为文章词句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低,即作品的气势、风格,决定于作家的“气”——精神力量和情绪状态;而“气”的获得又与作家的道德和文学修养密切相关。第四,韩愈还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指出“不平则鸣”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古今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这就把文学创作与社会矛盾联系了起来,为文学批判现实提供了理论根据,突破了文学单纯为儒家道统服务的狭隘观念。



韩愈的作品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散文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把先秦两汉的古文改造成为新型散文,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扩大了古文的表现功能。说理、记事、抒情、写人、状物,都很重视形象的鲜明生动和准确完整。文章的气势磅礴雄伟,自由奔放;感情曲折真挚,凄楚动人;语言明晰流畅,舒展自如,达到了“意无不达”的高度。他以当代口语为基础,吸取古人语言的有益成分,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从而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韩愈以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代新文风,把中国古典散文从僵死的骈文泥沼中拯救了出来,奠定了中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散文的雄厚基础,不愧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巨星。

原 毁



本文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在“责己”、“待人”上的不同态度作对比,论证了当时社会形成“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不良风气的根源,抒发了在这种风气下士人难以进身的不满情绪。文中善于排比,层层深入;运用对比,增强效果。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大贵族大地主把持朝政,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祖荫、门第轻易登上仕途;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需要通过逐级考试审核,才有可能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地位也不巩固,贬斥、罢官是常有的事。韩愈自己就有切身感受。因而他能深刻地揭露官僚权贵嫉贤妒能、压抑人才的腐朽现象;并对那些出身低微、仕途坎坷的士人寄予深切同情。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1],其待人也轻以约^[2]。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3],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4]。”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5],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6],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7]。”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8],即其新不究其旧^[9],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10]。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11]。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

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12]。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13]！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14]。”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15]。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16]，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17]，怠与忌之谓也^[18]。怠者不能修^[19]，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20]；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21]，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22]！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23]！



[1]重：严格。 周：全面。 以：连词，表示并列关系。

[2]待：对待，要求。 约：简单，很少。

[3]舜：传说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儒家所谓圣人之一。

[4]乃：副词，竟然，却。

[5]周公：姓姬名旦，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儒家所谓圣人之一。他是周文王子，周武王弟，周成王叔，辅佐成王治理天下。

[6]艺：技艺。

[7]病：过失，缺点。

[8]取：采取，肯定。

[9]即：赞许。 究：追究。

[10]恐恐然：害怕的样子。

[11]廉：很少。

[12]少：稍微。

[13]已：副词，表示程度，太，甚。

[14]用：作用，这里指本领，才能。

[15]闻(wèn)：名声，声誉。

[16]众人：多数的人，一般的人。

[17]有本有原：即有本原，有根源。

[18]怠与忌之谓：代词“之”字复指前置宾语“怠与忌”，如说“谓怠与忌”。

[19]修：学习，进取。

[20]与(yǔ)：党与，朋友。

[21]说：“悦”的通假，高兴。

[22]已：语气词，同“矣”。

[23]几(jī)：接近。 理：治理，本应作“治”，唐人避高宗李治讳，用“理”字代“治”。